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

李文海 主编 张晓虎 副主编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

主 编 李文海

副主编 张晓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

李文海 主 编

张晓虎 副 主 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 39 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9.5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0 000 册数：1—2 500

*

ISBN 7-300-01193-4

K·122 定价：4.10 元

本书作者(按文章排列为序)

程 歆	刘仰东	胡建华
彭岩超	杨东梁	房德邻
方 堃	张晓虎	鲁振祥
李文海		

前 言

有的文章把爱国主义称做是“常青的主题”，这话很有点道理。几千年来，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就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在漫长的奴隶制时代和封建社会，我国各族人民，就在爱国精神的鼓舞下，顽强地同黑暗的专制统治、同国家分裂和民族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社会，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愈来愈多的人将鲜血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生存的爱国事业，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之后，“振兴中华”的口号，依然成为激励人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战斗号角。未来如何呢？太远了不敢说，至少，在国家消亡以前（这也是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了），人们以真挚的感情热爱这“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的祖国，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进步和昌盛作出贡献，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值得称颂的高尚情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爱国主义。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就有那么几个人，公开表示了对于爱国主义的轻蔑。有的说：“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至少不是完全赞成。”还有的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

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还说：“决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地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难道一个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变成零的国家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吗？”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看法之前，我们想先加进一个小小的插曲：前面引的第三句话，显然是把国家和政府两个不同的概念相混了。试想，“祖国”怎么能够把人“变成非人”、“变成奴隶、变成零”呢？按作者的原意，显然是在那里指责政府，至于这种指责同客观事实背离有多远，任何一个稍为公正一点的人都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问题是，早在清朝末年，一些较为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要谈爱国与救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如果连政府与国家的区别都弄不清楚，也就根本失去了谈论爱国与否的资格。——本来，象这类小小的常识性错误，大可存心忠厚一点，不必深究的。但他们这些人，一开口就以“启蒙者”自居，摆出一付“唯我独醒”的架势，似乎别人全是“愚昧”得一塌糊涂，只有他们才是真理的化身。既然这样，我们也就偏要让人们见识见识，他们的某些看法，怎样落后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一些人的水平。如果读者有耐心将本书读完，就不难发现，这些自诩为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的识见，其水准大大低于清末思想界的状况，决不止于这里提到的个别例证。

现在再把问题拉回来：他们为什么那样不喜欢、不赞成爱国主义呢？这自然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实在是“太不可爱了”的缘故。确实，他们曾经用了许多笔墨，来形容我们祖国和民族的“丑陋”：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一堆糟粕和垃圾，“早就该后继无人”，加以“整体地打破”和“全面否定”；这种“千年不死的劣根”的文化，根本就没有同西方文明“对抗”的资格，只能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落伍和失败”；“中国可能有很多文化都要淘汰掉，彻底淹没”，对此“不需要太介意”，即使“面临彻底的完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由于“旧文明

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人民思想文化非常非常落后”，所以，我们的“民族正在自戕”，出现了“人的退化，民族的退化”；充满“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他们在强调“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的时候甚至感到“与人种不无关系”，就是说，不但我们的民族是劣等的，而且连“人种”也不行。自然，由这样的一些人民组成的国家，必然“让人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说，“中国是个没有个性的国家”，“中国是个处处有特权的的不平等的专制国家，它所提供的条件，最容易发挥人性的弱点，可以把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被抑止的人性弱点重新复活，发扬光大”；中国“社会上进入了全面的危机”；“我们现在是全面的落后状态，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总之，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仍然举步维艰。举目四望，贫穷遍地，愚昧横行，豺狼当道，精英毁弃，独裁专制，无民主、自由立锥之地！”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可憎”、“可恨”之不暇，哪里还“爱”得起来呢？难怪他们当中的一位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样的国家为什么非要爱她不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反对爱国主义，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或者反过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正是同爱国主义根本对立的。

其实，前面所引的那些话，都只不过是一种烘托，一种铺垫，目的是引出最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结论，那就是：中国任何别的出路都已经没有了，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或者象方励之在回答“中国的出路是什么”的提问时更坦率地所说的：“资本主义化！”

“全盘西化”这种主张，几十年以前就有人提出过了。但似乎谁也没有“化”个样子出来让人瞧瞧，因为谁也无法做到这一点。那末，“资本主义化”是不是就那么美妙呢？

诚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曾有过其先进和进步的历史时期，这就

像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后的早期历史作用一样，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领导并代表着进步的历史潮流。但“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私有制的内核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都将成为剥削压迫本质的妆饰物。一掷万金的豪富与颠沛求食的平民坐在一起谈“人权、平等”，岂不是滑稽得很么？而且，稍翻看资本主义发迹史，倘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谁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今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是将资本主义的天堂构筑在世界各殖民地几代人民的血汗和尸骨之上。那么，中国如果也去“资本主义化”，是否也要用炮舰加鸦片去扩张殖民市场呢？是否也要在一番杀伐流血（资本的早期积累阶段）之后，去形成几大经济财团并由这些经济财团为后盾扶植起政治上的党派体系、从而造成几党抗衡的“民主政体”呢？是否更要为达此目的而骂倒祖宗、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呢？

“全盘西化”也好，“资本主义化”也好，似乎都过于空泛，我们倒不如看看他们在不同场合开出的几付具体药方。这些药方，最有趣的有这样三种：一是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解体”；一是中国要再当“三百年殖民地”；再有一条是中国应该“引进一个外国总理”。这些主张，现在看起来似乎如同儿戏，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当时，却是郑重其事地作为解决中国往何处去的严肃政治问题提出来的，所以也还是值得对此说几句。

“解散”和“解体”论的发明者，现在是已经实践了自己的意愿，到海外当“世界公民”去了。这自然对谁来说都无关紧要。但中国如果真的“解散”或“解体”之后，十一亿多的人民，一齐跑到外国去当“世界公民”，不知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收容”得起？如果说，这十一亿多已被“解散”了的芸芸众生，并不跑到海外，依然只准熙熙攘攘地生活在业已“解体”了的无政府的中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特定环境之中，难道他们真的就从此“得救”，获得

了完满的自由、民主和幸福了么？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神话。

再当“三百年殖民地”？开出这张药方的人，大概是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彻底的“全盘西化”。那末反过来，真正实现“全盘西化”，也就不免成为殖民地的了。就“全盘西化”等同于殖民地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和他们的看法似乎没有什么分歧，用句时髦的话说，大家存在着一种“共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认为成为殖民地之后，“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可以告别“在封闭中的衰败”而走向“繁荣”；而我们则根据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地方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确切知道这不过是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将再一次成为任人宰割、掠夺、凌辱的奴隶而已。

至于“引进一个外国总理”，中国历史上倒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引进一个外国人来当掌握海关大权亦即掌握国家大门钥匙的总税务司，引进一个外国人来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团的团长之类的事，是早已有过的。这都发生在清朝末年的近代历史上，离我们现在并不那么遥远。而且那个时候，作为中央政权的朝廷，整个说来都要俯首听命于洋主子，因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是“洋人的朝廷”，论理说，实在比仅仅引进一个外国总理还要彻底得多。效果如何，那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早已回答了的，根本没有必要再在这里浪费笔墨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同他们一本正经去讲这些道理，即使不被人讥为“对牛弹琴”，起码也是迂得有点滑稽可笑。鲁迅说过，“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那末，我们还是不要一味争论此是彼非，倒不如把他们那些高论，同历史事实来作一点对比吧！看看我们的先辈们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再看看那些“精英”们前几年的言与行，从这种对比中，人们一定能够公正地作出判断，哪些是真的、善的、美的，哪些是假的、恶的、丑的，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缘由。

我们选取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的近代史。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有关爱国主义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尽量地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和评论。肯定地说,书中的许多具体看法并非十分成熟完善,但我们力图忠实于历史,决不为了某种主观意愿而对历史实际进行随心所欲的拼凑剪裁。我们所以把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研究的范围,是因为这八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危机最为深重,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最为昂扬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内,没有一个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历史运动,没有一个对祖国命运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不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活跃于历史舞台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史航船几度濒危,但这航船历经风雨而终未沉没,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航船上始终飘扬着一面任何敌人都无法摧毁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那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国魂”和“民魂”。

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被反动派囚于狱中、年青的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曾写下“一瞑负多疚,长歌招国魂”的诗句;另一位同时代的革命家赵声,则在诗中高歌“大好头颅拼一抛,太空追攫国民魂”。他们都不仅用语文和文字,而且用鲜血和生命去讴歌、去实践、去追求充满爱国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国魂”与“民魂”。鲁迅先生则说得更加清楚:“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又说:“惟有民魂是很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①近代社会有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不断沉沦的一面,也有人民不断觉醒不断斗争从而使社会不断前进的一面。正由于爱国主义的“国魂”和“民魂”的发扬,才最后取得了民主革命

① 鲁迅:《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1、152页。

的胜利,才有了今天独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中国。

让我们对那些魂系中华、情系中华的先辈们表示至深的敬意。

编 者

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

目 录

前言	(1)
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演变	(1)
近代爱国主义与献身精神	(47)
近代爱国主义与政治改革	(70)
近代爱国主义与学习西方	(139)
近代爱国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	(139)
近代爱国主义与国粹主义	(160)
近代爱国主义与民族战争	(190)
近代爱国主义与科技发展	(227)
近代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253)
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特点	(277)

近代爱国主义的 历史演变

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演变的转折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接受了时代的挑战和历史的检验，在忧患、抗争和求索的过程中发扬光大，进入了新的更高的精神境界。爱国主义同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先进思想潮流互相结合，是这一新境界的基本内容。各种谋求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救国方案，是这一境界的具体表现。而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则是这一境界的必然归宿。

内容提要：

1.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可将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失

败的二十四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第一阶段。此间，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代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还未来得及在社会内部产生。因此，首先起来迎接时代变动的，是封建社会母体中原有的进步力量——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的造反派。这两股力量的阶级利益、政治方向和救国方案都存在着根本区别，但时代条件又规定了他们都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苦难而作了最初的斗争尝试，并且在反抗外国侵略和谋求国家富强的目标上取得了若干共识。

-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的三十年，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之士从列强对中国所进行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侵略活动中，形成一种“变局”意识和主权观念，这是人们的社会忧患感在深化过程中增添的新内容。这已不是一种表面的、事过境迁的激越情绪，而积累为深人内心的对于民族苦难的体验和感受。
-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继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救亡激情与观念更新是此期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关心国事、参与政治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另一方面，民族危机进一步触发了理论危机，催化了以救亡为目标的观念形态的更新。
- 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十九世纪最后时日风靡一时的两个爱国观念——社会上层的尊王变法和社会下层的“扶清灭洋”，迅速让位给一种崭新的口号，即“革命排满”和“建立民国”，从而揭开了近代爱国主义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 从“华夷之辨”到反帝救国，从恪守传统到面向世界，从皇权主义到民权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内涵新陈代谢的基本轨迹，几乎涉及到近八十年风云变幻中思想界所面临的和企求解决的主要课题。这说明近代思想界的进步历程，是同爱国主义的演变发展溶为一体的。中国近代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任务，规定了爱国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爱国主义是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溶进了广阔的社会心理，又在此基础上凝炼为崇高的民族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爱国主义表现为人们对于江山故土和骨肉同胞的深切热爱，对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高度珍惜，对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休戚感、使命感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个庄严凝重的观念，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发展史上，它激励着一代代的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不息。爱国主义又是一个万古常新的观念，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丰富着自己的内涵，同中华民族开拓求新、奋发自强的历程同步前进。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史进入近代史的入口处，也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向近代式的爱国主义演变的转折点。历史以这一年为界限，独立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一步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而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也一步步走向高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接受了时代的挑战和历史的检验，在忧患、抗争和求索的过程中发扬光大，进入了新的更高的精神境界。爱国主义同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先进思想潮流互相结合，是这一新境界的基本内容。各种谋求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救国方案，是这一境界的具体表现。而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则是这一境界的必然归宿。

“述往事，思来者”。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的今天，重新回顾近代的英烈们为救国救民而进行斗争和探索的艰苦历程，总结近代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把握中国人民从爱国主义进而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对于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变历史遗产为思想财富，提高人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觉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意义。

一、反侵略爱国思潮的兴起

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把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这二十四年，称之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第一阶段，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向近代的思想文化过渡的阶段，也是古代的爱国主义向近代的爱国主义转变，开始展示出新的时代内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是代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还没有来得及在社会的内部产生，因此首先起来迎接时代变动的，是封建社会母体中原有的进步力量——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的造反派。这两股力量的阶级利益、政治方向和救国方案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是，时代条件又规定了他们都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苦难而作了最初的斗争尝试，并且在反抗外国侵略和谋求国家富强的目标上达到了若干共同的认识。这种在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的认识，使我们可以把这两股思潮划在近代爱国主义发展史的同一个阶段上。

第一，深沉的社会忧患感和时代责任感。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清王朝迅速地滑向了历史的下坡路。政治昏暗、军伍腐败、兼并激化、世风奢靡等等曾经是标志着每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征兆，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自然解体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同步俱来，使清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带着空前的深刻性和无可挽回性。然而，一种社会制度面临崩毁的信号，开始时却常常并不能为多数人所觉察和认识。清王朝的高度封建专制统治不仅箝制了人民，也麻醉了自己。封建官僚文恬武嬉。学人士子钻营名利。整个的社会与

论还陶醉在“康乾盛世”、“天下承平”的梦幻之中。正象一场大地震的前夕，只有极少数把握了地学物象的科学家才能预感它的严重性一样，近代深刻的社会危机在到来的最初阶段，也只是被少数保持着清醒政治态度的思想者所感知。这一批人是从醉生梦死的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先觉者，他们朦胧而又敏锐地触及到了时代的脉搏。出仕官场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和稍后的冯桂芬，下层士林中的洪秀全、冯云山和洪仁玕，是这批先觉者中的杰出代表。

鸦片战争前夕，地主阶级改革派怀着忧国、忧民、忧时的炽烈情感，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林则徐从政治的角度审时度势：“今日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①。魏源则进一步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社会，指出了当时的清王朝面临着前朝所没有遇到过的三大社会问题：黄河泛滥，水灾频繁，河工经费不堪负担；鸦片流毒，白银外流，田漕盐税入不敷出；士林好训诂，官场工应对，“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从而暗示了清朝政局要比明朝更加腐败和危险。对朝政时弊批判得最深刻的思想家是龚自珍。从嘉庆末叶以来，他一直用充满忧虑的笔触，揭示出了“日至将夕”、国势陵夷、大乱将起的人情世态。一方面，极其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对立，导致了全社会性的经济衰败和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庞大的官僚集团和其他的社会寄生势力还在迅速地膨胀，“豺踞而鸱视，蔓引而蝇孽”。因此，各种社会矛盾都尖锐化了，民怨载道，人心思变，“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③ 这些牵魂动魄的文字，体现了先进士人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焦灼。

① 《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② 《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上册，第163页。

③ 《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页。